



公共管理译丛

赵成根 主编

判断的艺术

——政策制定研究

The Art
of Judgment
A Study of Policy Making

[英] 杰弗里·维克斯 著

Geoffrey Vickers

陈恢钦、徐家良、张闯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赵成根 主编

判断的艺术

——政策制定研究

[英] 杰弗里·维克斯 著

Geoffrey Vickers

陈恢钦、徐家良、张闯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判断的艺术——政策制定研究 / [英] 维克斯著; 陈恢钦等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公共管理译丛)

ISBN 7-5006-5073-6

I. 判... II. ①维... ②陈... III. ①政策科学—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6291 号

The Art of Judgment—A Study of Policy Making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China Youth Press

Copyright © 1995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First published 1965 by Chapman & Hall

This edition published 1995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1 - 0521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28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 × 1000 1/16 19 印张 260 千字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27.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 84039659

总 序

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大规模的工业社会逐渐取代传统的农业社会,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带动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迁。工业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发展。民主政治和现代官僚制的产生和发展,是 20 世纪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也是影响和塑造 20 世纪的一种基本力量。

在一个现代社会的运转过程中,从经济管理、社会服务到国家外交和安全战略、外层空间的竞争,现代国家政府都以某种方式介入,承担了广泛的公共管理职能,政府能力因此成为衡量政府的一个核心指标。提高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提高政府管理效率的新的时代需求推动了现代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理论结构的重塑和理论重心的转移,也推动了以政府管理效率和政府能力为核心衡量指标的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

自从 1887 年伍德罗·威尔逊发表《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标志着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以来,公共行政学经历了制度视角的研究(1910—1930)、人的视角的研究(1930—1950)、管理过程视角的研究(1950—1960)和环境视角的研究(1960—1970)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 1970 年代末,公共行政学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一个主流学科。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和行政改革影响下,作为公共行政学新的发展阶段的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框架,应该具有怎样的基本结构呢?或者说应该怎样实现公共行政学理论结构重塑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在美国等公共行政研究极为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在公共行政研究尚处于恢复重建草创

期的中国,要实现公共管理学的迅速发展,使公共管理理论能够真正反映公共治理的内在规律,并科学地指导着公共治理之道的改革与发展,都必须充分地关注以下各种塑造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要素:

第一,以竞争性多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是现代西方国家制度的主体构成部分,在现代西方国家治理中,其他各种政治制度安排都要从属于这一民主政治制度,并受到其内在逻辑的制约。作为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其官僚制行政组织的结构体系和运作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民主政治逻辑的影响,综观今日西方国家的公共治理,从政府构成环节的政党竞争和选民投票仲裁,到政府预算和公共决策过程的民主参与、地方政府的民主治理,直到区域自治、城市自治、社区自治、公民自治等各种自主管理模式,整个政府系统运作和公共治理的各个环节,无不弥漫着民主的精神。因此,不理解民主政治,就无法理解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不以民主政治学理论为依托,西方的公共行政学就失去了其灵魂。

第二,如果说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百年,就是政府职能的扩展史,政府职能扩展的主要领域则是经济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政府已经成为塑造市场秩序、调控市场运行的一种主导力量。正是因为如此,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一个核心的研究对象就是政府、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也正因为如此,公共经济学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最新的主流理论流派,已经成为塑造公共管理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

第三,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公共管理和私人工商企业管理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融通和伙伴合作关系,但是,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行政改革的后果,市场理念和市场机制、企业管理模式成为影响公共管理直至重塑公共管理模式的一种基本力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影响下,西方的公共管理主体和公共管理模式都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第四,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后果。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商品只有成功地实现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资本追求利润最

大化的本质属性,就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一个统一的、开放的、自由的市场秩序,要求不断扩大的原料供应地,不断扩大的产品和服务销售市场。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国家的统一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也正是市场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现代的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全球化的动力蕴藏于资本的本质之中,全球化肇始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之初,当大英帝国的商船和炮舰开始驶向世界各地之时,全球化的历程就开始了。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发展成为影响现代社会的一种主导因素。

正是由于以上要素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公共管理实践模式和理论模式都在发生着重要的转型。本译丛作为近年来移译西方公共管理学术专著若干努力中的一项尝试,其选题也力图反映在以上诸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一批最新成果,从而为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界理解西方国家公共治理之道,理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译丛所选择的八部学术专著,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四部专著主要是关于公共管理理论在公共选择理论、官僚经济理论、制度分析理论和新组织经济学等的影响下的研究成果。《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是公共选择理论大师、官僚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姆·尼斯坎南最主要的学术专著。1971年尼斯坎南出版其经典理论著作《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运用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假设和分析方法研究分析官僚体制和官僚行为,并在系统批判官僚制组织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他的这部经典著作,不仅是批判官僚制弊端的扛鼎之作,其所提出的改革主张,更成为英国撒切尔政府新保守主义改革最主要的理论指导之一。出版于1994年的《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汇集了《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以及尼斯坎南就官僚经济理论这一主题20年间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是尼斯坎南官僚经济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而敦利威的《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则是综合分析民主政治体制和官僚制行政体制运作的一部力作。就职于伦敦经济学院政府系的帕特里克·敦利威是目前英国最负盛名的民主政治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之一。《民主、官僚制和公共选择》一书,在比较分

析了多元主义途径、统合主义途径、集体行动途径和新右派模型有关民主国家政府治理的理论观点之后,进一步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官僚机构塑造”模型,是透视当代民主国家治理之道的一部代表作。新西兰著名学者穆雷·霍恩的《公共管理的政治经济学》,则运用制度分析和新组织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公共官僚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对管制机构、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业等多种管理形式的分析,提出了在提供有效的公共管理过程中,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选择问题,是一部富有创新性和洞察力的剖析公共管理组织模式的代表作。霍恩的研究对于代理机构设计、管制模式创新和公务员制度改革都极具价值。鉴于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日趋发展的重要地位,本译丛还选择了英国著名学者拉本德拉·贾的《公共经济学》一书。

第二类两部专著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分析。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治理之道变革的理论概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新公共管理都正在重塑着公共管理的模式和结构。本译丛选译了瑞士著名经济学家、公共管理学家简·莱恩分析新公共管理内在逻辑的《新公共管理》。莱恩准确地将新公共管理界定为签约外包制(contracting-out)和用市场理念和市场机制重塑政府管理模式,构建企业家型政府(contracting-in),认为新公共管理是公共管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在书中系统地分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渊源、主要机制、内在机理和发展趋势,是系统论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部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英国学者诺曼·弗林的《公共部门管理》,则以最先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英国公共部门市场化改革为分析对象,在论述英国公共部门管理所处的政治与政策环境的基础上,详细地剖析了撒切尔政府、梅杰政府和布莱尔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具体地分析了业务外包、合同外购、强制竞争、私人融资协议、市场检验、战略性承包等市场化管理措施,并对英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成效进行了总体评价,对英国公共部门管理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是理解英国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第三类两部专著则是关于管理决策理论研究的。自从1947年赫伯特·西蒙倡导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以来,管理决策理论一直是公共管理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管理决策理论主要有两大研究取向,一是

以H·A·西蒙为代表的一般决策理论,重点研究人类组织决策的一般逻辑;一是由C·E·林德布洛姆、Y·德热等着力发展起来的政策科学,重点研究国家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以提高政府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改善公共政策质量。英国著名思想家杰奥弗雷·维克斯的《判断的艺术:政策制定研究》,属于第一种研究取向的一部管理决策理论研究经典著作,对西蒙所提出的决策理论进行了深邃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理论见解,是理解人类组织决策行为内在逻辑的一部理论巨献。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切尔·黑尧的《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则属于第二种研究取向。作为研究公共政策过程的一部名作,《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的关键特色和核心价值在于它超越了一般公共政策分析著作所遵从的理性分析传统,以现代国家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为研究对象和分析主线,“主要依靠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作为分析的工具”,透过对多元主义、精英主义理论、工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视角的国家理论,以及工团主义、政策网络、政策共同体、官僚经济理论、制度分析理论、宪政分析理论、强国家和弱国家理论,和理性决策模型、渐进主义、官僚理性模型、垃圾桶模型等理论模型的综合分析,为我们理解现代国家错综复杂的政策过程提供了各种可供选择的研究途径的图景。作者精深的理论分析,拨开了笼罩在现代国家政策过程中的种种迷雾,使我们得以清晰地洞察到政策过程的权力和利益博弈的实质。

我国的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重建以来,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仍然处于草创期!因此,要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公共管理理论,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以开放的姿态,充分地吸收和消化西方发达国家理论研究的成果。本译丛就是抱定这一宗旨而启动的。必须指出,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首先是以西方国家公共管理实践为基础形成的,西方国家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对有关学者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充分汲取有关研究途径理论营养的同时,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局限性;在充分认识到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普遍性,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绝不可以照搬照抄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

管理模式。

在选题、联系出版社和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众多同仁的惠助和支持。著名学者 Robert A.Dahl, Charles E.Lindblom, William A.Niskanen, Jr., Christopher Hood, Arie Halachmi, Jane-Erik Lane 等为选题提供了热情的帮助, Jane-Erik Lane 更友好地馈赠了他的《新公共管理》一书的中文版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浦劬教授、徐湘林教授等一直全力支持译丛的翻译出版工作,王浦劬教授并亲自承担了有关专著的翻译工作,崔冰女士在联系出版社过程中给予了重要的支持,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化教育编辑中心的编辑们为译丛翻译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各部译作中难免存在着错误和不足之处,恳切欢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2003年夏于燕园

译者序

杰弗里·维克斯爵士(1894—1982年)《判断的艺术》一书第一版发行于1964年。1994年,恰逢杰弗里·维克斯爵士百年诞辰纪念,《判断的艺术》一书再版发行。

此中文版根据1994年出版的版本翻译而成。

20世纪中叶,维克斯立足于当时英国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实践,从他自身广泛的生活实践出发,在他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基础上,运用他那不凡的洞察力和理论抽象概括能力,展望公共管理领域在新世纪的前景,出色地分析了将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完成了他的代表性著作《判断的艺术》。

维克斯面对当时技术理性一统天下,以及技术—工具理性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造成的影响,力挡这股潮流,提出公共管理领域必须注重伦理、政治价值,从而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展开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维克斯认为,形成判断是所有人都具有的行为,而对于职业管理人员来说,做出判断必须对照普遍的标准,必须对现有情境进行评估,因此,形成判断不仅需要抽象的理论储备,还需要有个人的感知。形成判断从来不限于仅仅对事实的确定,更重要的是对事实所隐含的伦理和政治价值进行评估,并由此发展了他的评估、系统、预测等一系列概念。

该书独具匠心地探讨了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判断的本质,清楚地论述了三种性质的判断:事实判断、工具判断和价值判断;探讨了在不同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形成决策的种种限制、过程及处理;展现了作者对21世纪将要面临的一些复杂的公共事务所进行的深入的思考;反思了当时的公共管理理论,对一些核心概念进行了重构,在系统思维的指

导下对系统思维、评估、判断、评估系统、预测、创新、增长、责任等概念做了界定；考察了作为心智技能的政策制定、作为机构过程的政策制定、在决策情境中的政策制定以及人类生态系统中的政策制定。他提出的思想和论及的主题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受到了高度的评价，这些研究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有新颖和独到之处。这证明了翻译本书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

该书在论述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案例，有些案例是社会生活中真实的、主题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形成的英国三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论及的主题有交通、教育和死刑等，在今天读来，我们仍然会把这些问题与我们现实的社会问题相联系。

有些案例是虚构的，但能看出来，它们显然是来自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读起来很有趣，几乎写得像小小说，黑(Black)先生、绿(Green)先生，以及白(White)先生、死字母(Dead letter)先生、红字母(Red letter)先生，个个都栩栩如生，让我们觉得作者揭示的这套理论是如此地贴近生活；不过，作者的体验本来就是从生活中来的，而且旨在为公共领域中政策制定、判断的形成有操作实践的指导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高超的在抽象理论和具体实例之间经常转换的驾驭能力。

《判断的艺术》一书主题广泛，内容丰富。第一部分探讨了作为心智技能的政策制定，界定了管理、评估、研究、评估系统、预测、创新、评价和管理的限度等概念，特别是对三个评估案例做了分析。第二部分探讨了作为机构过程的政策制定，区分了各种类型的机构，考察了机构的差异可能对各种不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讨论了决策情境中的政策制定，作者考察了那些要求行动的现实情境中的政策制定，并分析了不同情境对于制定或修正政策的影响。第四部分专门探讨了人类生态系统中的政策制定。由这样四个部分构成了《判断的艺术》一书基本的分析框架和主要内容。

本书正文后附有主题词索引，在正文旁侧标有原文页码，以备对照查找。

本书由陈恢钦、徐家良、张闾译校。陈恢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家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张闾，北京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博士生。

由于译校者的学识和翻译水平有限,译文中的误译和翻译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谨识

2003年12月6日

百年纪念版前言

在我们中间,心智健全的人同疯狂的人一样,都会像蜘蛛那样依系于自己所编织的网中,茫然地游离于空间之中并被变幻多端的风雨强烈地震撼着。虽然,很多人通过这张脆弱的网看到的只是虚无,但它却是一个不朽的人工精品,是人类的一个真实标志,对它的编织就是我们的基本责任。 xiii

杰弗里·维克斯(1964年版,477页)

对于每一个熟悉杰弗里·维克斯爵士的人来说,都不会否认《判断的艺术》第一版发行以来的30年间,它在社会科学、社会理论以及哲学领域中所引发的概念的广泛变化。这些变化或许不容置疑地证实了这样的感觉,那就是:维克斯是他所处时代的带头人,这又使得本书(也是被人提及最多的著作)的重新发行非常的适时,非常的受欢迎。维克斯思想有许多新颖之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世纪中叶所进行的独具匠心的一项研究,该项研究极为敏锐地理解和讨论了我们在21世纪初(即维克斯预见的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世纪)将要面临的公共事务中的复杂问题。 xiv

近年来,对有组织的人类活动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如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的传统理解遭到了无可挽回的质疑。力图赋予这些概念以新的含义是当前最重要的研究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杰弗里·维克斯爵士的著作应当赢得新的关注,他接受过人类学方面的严格训练,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都有过成功的经历。的确,在现在,不论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公共管理的研究者,或是执行者,也许都更加有条件去发现维克斯著作的价值,这与1965年,

即本书第一版出版时的情形已大不一样了。

《判断的艺术》是一本研究管理和决策制定的经典著作,该书使维克斯成了20世纪公共管理领域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同切斯特·巴纳德和赫伯特·西蒙等人齐名。然而,《判断的艺术》一书不仅仅是一本经典著作,而且也启迪着我们的思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书能比它更好地论述政策制定中判断的本质,也没有哪一本书能比它更能满足21世纪日益涌现的各种需求。这是一个大胆的论断。然而,维克斯的著作,尤其是在《判断的艺术》中,人们发现那些关于判断形成的洞见仍然比当代一些论述管理和决策的著作内容要丰富得多,后者在认识和分析技术上存在着视野狭隘的通病。

在此前言中,我们想传递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判断的艺术》是怎样的切合公共管理思想,是怎样的切合杰弗里·维克斯爵士广泛的工作的。同时,我们还想强调一点,那就是作为思想家的维克斯是通过作为人的维克斯完整而深刻地表现出来的。作为其博士生,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幸能在20世纪70年代杰弗里先生多次访问美国期间与他结识和交往。他的观点来源于他的日常生活并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展示出来,清晰而快捷,我们欣赏这种方式。我们被他的真诚所打动,被他的绅士风度、现实的观察力以及无限好奇心所打动。他不失时机地接受了广泛和多样性的人生经验,他对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感受。他的聪明才智表现在他有能力对于人类的事务做出有说服力的、深邃的阐述,既不会脱离实践经验的基础,也考虑到与其对话的对话者的立场。我们认为,这种人际间的亲和力对于一个有奇妙的整合力和思想的人来说是生动的展示,而且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仍然是洞察力和快乐的源泉。

《判断的艺术》一书在作者百年诞辰之际再版,它反映了我们的希望,即杰弗里爵士的著作将继续影响那些认为判断的基本艺术有助于指导我们的公共生活和工作的广大读者。

管理和决策

当切斯特·巴纳德出版《经理人员的职能》(1938年)的时候,他也

像维克斯一样,有着职业经理人的成功经历。巴纳德深受当时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著作的影响,尤其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影响,而且他看出了社会理论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伟大前景。然而,巴纳德从未被人们说成是“科学的”思想家,因为《经理人员的职能》同那种与社会学相关的严格和客观的风格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尤其是当社会科学在其后1/4世纪多的时间里得到发展的时候。譬如说,在整个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那些卓有成效的从多方面研究管理的社会科学家,却很少从管理的道德维度或美学维度进行研究。然而,巴纳德却极其热情并很有说服力地做了这件事。他把管理行为描述为沟通“一个组织的感受,强烈的审美感受”,在这一描述的过程中陈述了他的见解。而且,他为那些持有狭隘科学观的人所做的努力感到惋惜,“因为许多人对组织科学不感兴趣是由于他们没有感觉到组织的艺术……他们由于没有乐感而不能理解交响曲的构造、作曲的艺术和演奏的技巧”(巴纳德,1938年,XIV页)。

10年以后,当赫伯特·西蒙(1947年)出版了《管理行为》的时候,他批判了管理“原理”中的流行观念,他把这些流行观念指责为“谚语游戏”,是伪科学。西蒙认为,对人类行为的真正科学的解释应当能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组织的人类行为一贯比现行观点所假定的情形更加缺少理性和缺乏自我价值的最大化。为了说明这一难题,西蒙引进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令人满意”(“satisfying”)这两个实用而有启发性的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蒙没有进一步去探讨人的动机和价值判断等因素,这些因素在某些人看来是用来说明上述概念的(如维克斯所说的),而是继续(尤其是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把这些概念置于令人吃惊的狭隘的技术理性中。以至于到最后,西蒙鼓吹决策制定的电脑化模式的前景,并用无限的热情探讨人工智能应用于管理的潜力,几乎要将人类完全排除在管理实践之外。

在西蒙走过的道路上,他既是领导者又是追随者。20世纪,在许多研究社会事务、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本质的领域的理论研究以及在在这些领域进行管理实践方面所做的许多努力,一直受到技术理性、专业化、行为主义和官僚化的主宰。这一取向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

学世界观的统治,而科学世界观则兴起于启蒙运动,并与有着极大社会影响力的技术齐头并进。20世纪初,物理科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巨大成就,以至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者很有把握地企图将同一方法,将类似科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应用于我们对社会的研究和理解中。对于一些富有意义的、社会领域内的更重要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这种科学世界观的取向却没有为他们留下多少立足之地。

伴随着巴纳德的实践感受和西蒙所阐述的深刻性的概念,维克斯的《判断的艺术》是对这种取向提出异议的独特而严谨的著作之一。正如我们在下面所略述的,维克斯认为,形成判断是所有人的行为(包括职业活动)必需的要素。实践管理必须对照普遍化标准,对现有情境进行估价,因而,它需要既有抽象理论又有个人具体感受的知识,形成判断从来不限于仅仅对事实的确定;它还始终需要有对事实的评价,需要我们对这些事实的伦理含义和政治含义进行恰如其分的衡量。

系统思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学者,像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洛斯·阿什比(Ross Ashby),以及后来的格雷戈里·巴特森(Gregory Bateson),形成了一个广泛参与的知识分子团体,提出了一套关于系统以及系统控制的理念,这套理念起源于各种技术领域。经过广泛讨论,很快地形成了其特有的应用领域和概念群。然而,系统观念本身被普遍地理解为由各部分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它大于并不同于各部分的总和,而且依赖于一种保持各部分之间关系的稳定的“控制”机制,这种机制能够跨越时间,又能同环境进行相互作用。维克斯像许多人那样深受早期关于系统研究工作的影响,凭借他的“评估系统”(“appreciative system”)这一概念,对系统研究做出了富有特殊价值的贡献。

大约在杰弗里爵士1955年退休的时候,他开始在系统隐喻中看到了一种很有前景的方法,用它来解决关于组织和社会的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使他在公共和私人组织工作期间大伤脑筋。特别是,他关注到在人类集体活动中判断所起的作用。维克斯认为,这种活动不是围

绕信息而是围绕意义展开的，这些活动很少是“目标追求”（“goal seeking”）的产物，更多的是“目标设置”（“goal setting”）的产物。维克斯认为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判断——第一种是认识论的判断，第二种是评价性的判断，第三种是工具性的判断。他把工具性的判断看成是用来执行其他两种判断的最好手段。维克斯把这些不同类型的判断看成是个体活动不可分割的几部分，他将这种个体活动称为“评估”（“appreciation”），相应地，他又把“评估”视为人类系统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因素。

xviii

许多早期的系统理论家很快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普遍系统论的观点方面，这些观点同样可以应用于所有形式的系统，包括自然的系统、机械的系统以及人类的系统。这种理论在保持现代认识论主导的技术理性的同时，又把目光投射到了那些可以通过技术来完整地描述和运行的系统。伴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加上智能管理信息系统的出现，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系统思维的倾向。多年以来，理论推理被简化为技术模型，因此它越来越有损于人的判断对这类过程的作用，而人做出判断的过程，由于有许多潜在要素的存在，有效地抵制了完全简单化和分析性的方案所设置的固定模式。

维克斯的研究从《判断的艺术》开始，到1983年的《人类系统是有差异的》告终，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有意地避免着研究视野的缩小，而这种研究视野缩小的趋势在当时对有组织的人类活动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方面都已经形成异常强大的力量。其“评估”概念则是这种努力的核心要素。同时，格雷戈里·巴特森（1972年）希望保持比一般标准更开放的“系统”意识。然而，正当维克斯和巴特森相互欣赏彼此工作时，他们却在研究伦理的起源和作用方面出现了分歧。巴特森认为，既然所有的系统都是同一的，那么，道德便可以进入可能建立的所有的系统过程中。相反，维克斯却看到了人类系统内部的道德特征，这种道德特征使人类系统与自然的和人造的两种系统相区别。维克斯断定，无论从个人意识层面还是从人类文化层面来看，评估都是人类活动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认为，评估是达到拓宽研究视野目的的一种方式，而拓宽研究视野无论是对于行为世界的实际理解，还是对责任行为的理解都是必不可少的。